

中外近现代教育家

曹福成 杨五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3681/02

87
K815.4

10

中外近现代教育家

曹福成 杨五云

山西人民出版社

B

405262

475

中外近现代教育家

曹福成 杨五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26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

书号：70881483 定价：2.70元

序

张维庆

教育事业如何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教育发展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进行历史的现实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也应当借鉴中外历史，尤其是近代、现代史上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理论和新体制。

我国和世界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产生过许多热心并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成就卓著的教育家，即使是一些从事哲学、政治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也提出过许多有关教育的见解和论述，有的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教育实践。各个时期的教育家们，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教育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教育的本质和特征，对当时和后来的教育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这些历史遗产，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们发展教育事业提供借鉴，无疑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实际工作。

曹福成和杨五云同志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在阅读原著

的基础上，对大量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写成《中外近现代教育家》一书。书中介绍了中外教育家的生平事迹、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阐述了他们教育思想中的精华，同时也指出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热心于教育史的研究，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探索教育规律，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正在深入进行的教育改革，是有参考价值的；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相信也会有所裨益。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序.....张维庆 (1)

上 编

张之洞.....(1)	张伯苓.....(94)
马相伯.....(6)	张寿镛.....(100)
刘光蕡.....(11)	徐特立.....(104)
张焕纶.....(14)	经亨颐.....(109)
张百熙.....(18)	王国维.....(113)
黄遵宪.....(22)	黄炎培.....(118)
孙诒让.....(29)	吴玉章.....(123)
张 謇.....(34)	高镇五.....(129)
严 复.....(37)	陈 垣.....(134)
康有为.....(43)	鲁 迅.....(139)
范明枢.....(48)	李仪祉.....(147)
丘逢甲.....(53)	马寅初.....(154)
蔡元培.....(58)	马约翰.....(159)
杨昌济.....(64)	李更生.....(163)
鞠思敏.....(77)	朱剑凡.....(167)
梁启超.....(80)	萧友梅.....(173)
陈嘉庚.....(85)	马叙伦.....(178)

夏丏尊.....	(184)
张子高.....	(191)
雷沛鸿.....	(195)
许崇清.....	(199)
李大钊.....	(204)
林砺儒.....	(209)
刘仙洲.....	(214)
李 达.....	(219)
陈望道.....	(227)
陈鹤琴.....	(231)
陶行知.....	(236)
杨明轩.....	(247)
廖世承.....	(253)

舒新城.....	(259)
叶圣陶.....	(263)
恽代英.....	(268)
刘湛恩.....	(273)
杨贤江.....	(277)
成仿吾.....	(283)
车向忱.....	(288)
李敷仁.....	(295)
王亚南.....	(299)
江隆基.....	(306)
戴伯韬.....	(310)
程今吾.....	(316)
丁浩川.....	(321)

下

编

夸美纽斯.....	(324)
洛克.....	(328)
卢梭.....	(332)
狄德罗.....	(338)
爱尔维修.....	(342)
裴斯泰洛齐.....	(346)
欧文.....	(354)
赫尔巴特.....	(360)
福禄培尔.....	(366)
第斯多惠.....	(371)
斯宾塞.....	(377)

乌申斯基.....	(383)
车尔尼雪夫斯基.....	(390)
托尔斯泰.....	(394)
列士葛伏特.....	(400)
凯兴斯泰纳.....	(405)
杜威.....	(409)
克鲁普斯卡娅.....	(415)
蒙台梭利.....	(422)
加里宁.....	(426)
马卡连柯.....	(431)
凯洛夫.....	(437)

科南特.....	(442)	赞科夫.....	(456)
皮亚杰.....	(446)	布鲁纳.....	(461)
斯卡特金.....	(451)	苏霍姆林斯基.....	(466)
后记.....	(474)		

张 之 洞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中年后号壶公，又号无境居士，晚年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末洋务派首领，著名的教育活动家。生于一八三七年，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他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先后受业于十三位老师，其中进士三人，举人四人，生员六人。他从小即聪颖善学，博览群书。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三十岁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任湖北学政，主管全省教育。一八七三年，任四川学政。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授侍讲学士。他讲求气节，与张佩纶等纠弹时政，号为清流。次年擢内阁学士。一八八三年在他任山西巡抚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在侵略者面前他是坚决的主战派。在被调往两广任总督后，他起用冯子材，声援刘永福黑旗军，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乘胜克谅山。他主张乘胜前进，反对李鸿章罢战求和。在任期内，他设学堂，建工厂，开展洋务活动。创办广东水陆学堂，设立枪炮厂，开矿务局。一八八九年，调任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力主筹办芦汉铁路(从北京郊外芦沟桥到湖北汉口)。一八九五年后，又建武备学堂、农工商学堂、铁路学

堂、军医学堂等。张之洞起初赞成变法图强，他曾给康有为、梁启超很多方便。但由于慈禧太后顽固派对改良派采取了血腥的镇压，张之洞转为保守，向统治者呈上《劝学篇》，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遭到改良派的抨击，揭露了他的学说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反动本质。但同时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赏，当即命令“广为刊布”。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他参与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并镇压两湖反洋教斗争及拥护光绪帝当政的“自立军”起事。此后与张百熙、荣庆、刘坤一等上书朝廷，提出对实业进行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并请改学制，变科举，设学堂和奖励出国留学。他主拟的《奏定学堂章程》，提出许多教育方案。一九〇二年任商务大臣，署两江总督。一九〇三年任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并参与修改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年，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了西方的一些近代学科，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培养目标则由封建官吏和士大夫转变为各类专门人才。一九〇四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而爆发战争。次年，张之洞与一批封疆大吏上书朝廷，指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限，必自推广学校，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是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当然，这种废除不会是彻底的，其残余影响仍严重存在。一九〇六年，张之洞晋升大学士。一九〇七年，授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主管全国文教。一九〇八年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病死。次年宣统帝溥仪登基，醇亲王载沣摄政。张之洞以顾命重臣身份参与决策，加封太子少保。是年病死，终年七十二岁。

张之洞在二十四岁时写的《叙辈词》中有“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之句，可以说，这是他一生行动的准则。他受过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早就怀有“经世”之志，这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上，就是“通经致用”。所谓“通经致用”就是精通儒家教义，用以维护封建统治。中法战争对张之洞的教训是深刻的，使他的教育思想从“通经致用”转变为“中体西用”。因洋人枪坚炮利，水师发达，而清军水师无人，枪炮不具，故而受制于敌。为此，他决心学习西法，大办洋务，大兴学堂，逐渐形成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中法战争后，在他创立的广州水陆学堂中，以“英文、算学为初基”，继而学习驾驶、管轮、陆师各项知识，又开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等“洋务五学”。他在学堂中大量开设西学课程，在他创办的西湖书院里，开设的西学课程达十五门之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核心。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中国封建文化为教育的主体，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张之洞强调指出：“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若学堂不读经……中国必不能立国”。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在“中学为体”的大前提下，学习西方治国方略和先进的科学文化，来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劝学篇》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理论概

括，它是张之洞长期从事政治、教育实践的产物，是洋务派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劝学篇》分序言和内外篇。《序》中阐述了撰文的主旨，即使民知“祸”之将及，倡兴学堂，调和新学和旧学的矛盾，维护封建统治。内篇九篇，讲中学。“内篇务本，以正人心”，主要讲如何继承孔孟之道，强调以“中学”为主导；外篇十五篇，“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主要讲学习“西艺”、“西政”。“西政”即兴办学校；“西艺”即现代科学知识。“中体西学”的思想反映了张之洞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反动性，但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清末民初的教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劝学篇》中提出的一些教育主张和办学经验，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及荣庆在推荐张之洞时说：“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此中利弊，阅历最深。”

张之洞很重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他认为，教育发展了就会减少国家的内忧外患，而使国泰民安。这种看法掩盖了社会政治的主导作用，当然是片面的，但他突出强调教育的作用这一点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张之洞对教师的要求是要有真才实学，他在《学务纲要》中提出“教师宜多看参考书。……为教员者，除讲授时按照章程内所列各书及将来审定颁发各书外，仍须博览旁搜，以备参考。”他要求管教育的人是内行，应学一些“教育学、学校管理法、教育行政学、学校卫生学、师范讲义、学务报、教育丛书等类”的书，使“所办学堂不致凌杂无序，亦不致枉废师生功力，庶较胜于冥行歧误者”。要求学生、

“各学堂尤重在考学生品行，造士必以品行为先。”

在教学上，他首先提出“各学堂皆学官音”的要求：“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为后来白话取代官话成为全国教育教学的统一语言创造了条件。他提倡学生自学，教师只起指点门径的作用，而治学能否有得，全在自学之功。

张之洞一生以极大的热情和巨大的精力贯注于教育，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他兴学堂，编教材，定学规、学制和学纲，视察教育情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为推动教育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马 相 伯

马相伯，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复旦大学的创办者。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祖籍江苏丹阳，一八四〇年四月生于丹徒县（今镇江市）。父亲是个医生，其父母和外公、外婆都是天主教徒。他出生后不久就受到洗礼，取教名“若瑟”，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马相伯的幼年，正值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他目睹国家的内忧外患，深为国家忧虑。一八五一年冬，十二岁的马相伯背着父母到上海，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在这里他学会了拉丁文和法文，数学和天文学也学得很好，成绩优异超群，法国驻沪领事闻其名，欲聘为秘书，遭到拒绝。一八六二年，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两年学习期满后，在耶稣会研究中国文学和拉丁文学，后又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一八七〇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后被授职神甫，并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一八七六年，因不满教会的专横，退出耶稣会，转而从事政界活动。曾为清政府办过洋务，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还曾为李鸿章筹办海军赴美借款。他为清政府出过不少“富国强兵”的主意，但均告失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请他主持筹设译学馆，事将告成，因变法失败而告吹。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失败又惋惜，又畏惧。

一八九九年六十岁时，他回到上海，过起隐居住活。他曾怀有“教育富国”的理想，从他的切身经历中认清了“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其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他毅然决定毁家兴学，筹办教育事业。他将其长兄马建勋所遗三千亩田地作为学校基金，又将仅存现洋四万元，八处房地产（价值十万余元）全部献出。当时各省的有识之士也纷纷相助，同时也借耶稣会之助，于一九〇三年创办了震旦学院，自任监院，此时马相伯已六十四岁高龄了。

马相伯认为，学校是研究学术的机构，不是宣扬宗教之所，所以尽管该院借耶稣会之助，仍规定“不谈教理”。他还掩护学生的反清活动。这就引起了教会和清政府的不满。一九〇五年，任教的外籍教师趁马相伯养病之际，改变办学方针，“尽废旧章，别定规则。”（《马相伯年谱》）致使学生大哗，摘下“震旦”校牌，愤然离校。马相伯也毅然和学生一道退出震旦。

马相伯离校后，偕同离校学生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并得各界知名人士赞助，重新筹建学校，新校名定为“复旦”（取复我“震旦”的含义）。经费和师资缺乏，师生们就自力更生，共同奋斗。继得两江总督周馥赞助，拨地拨款，以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同时，又由严复、熊希涛等二十八人出面发表《复旦公学募捐公启》，得到各界赞助。复旦公学遂于一九〇五年中秋节正式开学。马相伯被推为校长，兼任法文教授；李登辉主持教务，经苦心经营，逐步打下复旦大学的基础。民国成立后，马相伯被江苏都督府聘为外交司长。他仍兼任复旦校长，并面邀孙中山

先生任复旦校董。一九一三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他曾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旋辞去，改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在北京四年期间，曾与章太炎、梁启超拟议创办“函夏考文苑”（类似研究院）未成。又与英敛之发起办辅仁学社，招集学生，讲授经史百家之学，这就是辅仁大学的前身。

马相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他驳斥了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以后出京居上海。一九一八年，他发表《民国民照心镜》，表现了他的立宪共和思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马相伯痛感国难深重，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他说：“国亡无日，非朝野一心，武力抵抗，无以自救”，（《马相伯年谱》）“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马相伯国难年论集》）他以九十岁高龄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国难会和不忍人会，主张抵制日货，号召为抗日将士义捐。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事变中，他曾从战区抢救被难同乡三千多人，陆续遣送回籍。他被誉为“爱国老人”。一九三三年他又要求“立即召集国民大会，政府与全民统筹国是”。他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内战主张，对蒋介石悍然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极为愤慨。有碍于马相伯的社会威望，蒋介石只好采取软的一套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同年十月上海沦陷，日军逼近南京，桂系军阀李宗仁等请他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十一月，于右任又请他移居昆明，在赴昆明途中他因病留居越南谅山。一九三九年四月，马相伯年满一百岁（虚龄），上海复旦同学会为

庆祝马老百岁寿辰举行招待会。马老自凉山亲笔来信，信中说：“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十一月四日，马相伯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恢复失地，不断口呼：“消息……消息”直至声音微弱，溘然长逝。中共中央自延安发出唁电悼念，《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盛赞马相伯热忱爱国，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解放初，陈毅同志派人去凉山将马相伯灵柩迎归安葬，并举行“反帝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安葬纪念会”，党政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会后灵柩安葬息然公墓。陈毅同志在安葬时说：“马相伯先生，是一位反帝爱国者，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毁家兴学，办了不少学校，震旦和复旦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

马相伯的名字是和复旦大学联系在一起的。他为了创办该校，历经艰辛，惨淡经营多年。他早就怀着“教育富国”的愿望，认为救国者当从教育入手。他一心向往在中国创办一所新式大学，传授西学，为国培养人才。他本着“发展科学，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采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尽量使学生多学一些有用的知识，为国家造就有用的人才，从而使国家富强起来。他设置课程“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意见开展讨论，并“挈举纲领，开示门径”，启发学生自己研究探讨。他规定每星期召开演讲会，定出学术讨论题目，由学生各抒己见，并进行评比。于是，学校气象一新，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争相竞出。又出版了墙报、校刊、学报、年鉴等；组织了戏剧社走向社会，为支持爱国运动进行义演。当时的复旦被称为